
宏观历史视野下的中国现代化^{*}

——阶段递进与路径选择

李怀印

摘 要:中国的现代化始自 19 世纪中叶, 国人开始有意识地探寻适合本国国情的生存发展道路, 前后历时约两个世纪。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可分为前后连贯的几个阶段。(一) 19 世纪后半期的救亡图存, 使晚清中国避免了绝大多数非西方国家所经历的殖民地化, 也避免了世界史上各大帝国在衰落过程中所普遍发生的四分五裂现象。(二) 20 世纪前半期的国家转型, 使中国从一个传统的疆域国家转变为高度统一集中的现代主权国家。(三) 正是在前两个阶段所奠定的“既大且强”的基础上, 20 世纪后半期整个国民经济的工业化得以全面完成。(四) 在 21 世纪前半期的“走向成熟”阶段, 凭借地缘、规模、劳动力、体制等方面的一系列优势, 中国将完成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长期维持经济平稳增长, 在 2035 年前后迈入发达国家的门槛, 最终在 21 世纪中叶加入高度现代化国家的行列。中国的现代化之所以能够成功, 在于其历史起点、国家形成的道路、工业化的战略以及步入现代化经济体的路径, 均不同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

关键词: 现代化 全球化 工业化 国家形成 中等收入陷阱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的现代化发轫于 19 世纪 50 年代, 始自国人开始有意识地探寻最适合自身国情

李怀印, 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历史系讲席教授。

^{*} 本文内容部分摘自即将出版的拙著《中国的现代化: 1850 年以来的历史轨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5 年版)。

的生存、发展道路。1842年,也就是清朝在鸦片战争中被打败当年,魏源撰成《海国图志》50卷,此后陆续有所增补,到1852年扩至100卷。魏源反复增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让国人睁开眼睛,了解世界,找到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差距,着手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习,“师夷长技以制夷”。大体上,我们可以把1850年前后视为中国现代化启动的原点;正是从那时开始,先进的中国人第一次具备了全球视野,朦朦胧胧意识到西洋各国的制胜之道,体认到仿效、移植西洋“长技”的必要性。

从那时算起,中国的现代化已走过一百七十多年的历程。再过二十多年,到21世纪中叶,中国有望走完现代化的全过程。换言之,中国的现代化,前后持续约200年。中国将从一个以传统农业为主、对外部世界缺乏了解和认知的状态,转型为一个以现代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体、充分融入全球信息网络和知识体系的崭新文明。

关于中国现代化历史过程的研究,海内外学界已有很多成果。历史学者的作品大多聚焦于晚清和民国时期的思想文化变迁和经济政治制度变革,很少把1949年以前的现代化(或谓“近代化”)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巨大转型作为一个完整过程加以综合考察。^①而研究1949年以后中国现代经济社会转型的著述,又很少跟此前的历史发展过程有机地结合起来。其实,历史是无法割断的,现代化过程更是一个连贯的整体。早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现代化研究的鼎盛时期,即有西方学者对现代化的全过程,先后提出各式各样的阶段划分。^②综合这些研究,并结合各国现代化的历史实际,我们可对现代化各阶段的轨迹在一般意义上作如下归纳。

当一个传统社会开始面临现代化的挑战并且再也无法规避时,广义上它便进入了现代化的长期过程。挑战的形式是多样的,可以来自社会内部,源自知识的增长、观念的变革,以及生产力的进步;也可以来自外部,源自军事上的冲击和民族生存危机,以及由此所引发的人们对现代变革的渴求。当挑战达到一定程度时,现代化便进入准备阶段,这一阶段所要着重解决的是为现代化的起步所必需的种种先决条件,其中主要是一个以现代化为政策取向的新型政治权力和制度。在这些先决条件都基本具备之后,现代化才可能正式地、大踏步地向前推进,迈入工业化全面起步阶段。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的地步,又必然引起人口从乡村向都市、城镇的大量迁转,导致经济结构的复杂化、经济利益的多样化和社会结构的多元化,并由此带来政治体系的相应

① 其中最重要的有:章开沅、罗福惠主编:《比较中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胡福明主编:《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以及虞和平主编:《中国现代化历程》,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海外中国现代化研究最具分量的当数Gilbert Rozman, ed.,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1.

② 参见W. W. Rostow,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 C. E. Black, *The Dynamics of Modernization: A Study in Comparative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6; 以及Ronald Chilcote, *Theories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The Search for a Paradigm*,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1.

变革。这时,整个社会进入了由量变到质变的转型时期,这个转型期,便构成了现代化的最后一个阶段,即走向成熟阶段。一旦此阶段结束,一个社会便转型为“后现代化社会”,亦即高度现代化的发达社会。

19 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国现代化历程,也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大体上可分为五个时期,即(1)晚清以调整自我定位和救亡图存为核心内容的“挑战”阶段,(2)民国时期以国家转型为中心的“准备”阶段,(3)始自 20 世纪中叶的工业化“起步”阶段,(4)80 年代初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增长”阶段,以及(5)从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的“走向成熟”阶段。

这些不同的阶段之间有怎样的逻辑关系?每个阶段各有哪些特征?把这些不同阶段的逻辑联系和特征归纳起来,对于我们认识历时 200 多年的中国现代化的轨迹有何启发?最为重要的是,中国现代化的成功实现,对于世界经济和政治秩序的重建,以及现代化理论的重构,将有何含义?这些将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二、晚清时期(1860—1911):现代化的艰难启动

相较于其他国家,晚清中国的现代化启动过程异常艰难。清朝统治精英的世界秩序观和自我定位,对其正确认识来自外部的挑战和形成有效的应对方案,形成巨大的障碍。

作为一个大国,中国自古以来有着大一统王朝的历史传统。历代统治者均把平定天下、巩固疆域,当作首要任务。到清代前期,中国的疆域已经涵盖内地 18 省,以及周边的蒙古、新疆、西藏等藩属,再加上中国之外的朝贡国(朝鲜、琉球、安南、缅甸等等),形成了一个垂直型国家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清朝皇帝作为“天下共主”高踞其上,御临内地 18 省和各藩属,而中国之外的朝贡国既有定期赴京师朝贡的义务,又享受清朝的保护;中国与外国的关系成了国内政治秩序也就是君臣关系的自然延伸,故而迥异于近代早期欧洲列国相互之间的平行关系。欧洲列国之间,彼此平等竞争,在国际法框架下以主权国的身份相互交往。而清朝则以上国自居,践行儒家说教所界定的纲常伦理,把中国之外那些不习这套伦理道德、不接受清朝礼仪规范的各国,视同蛮夷。中国与周边朝贡国之间的关系,不仅是以上临下的等级关系,还是礼仪之邦与夷蛮之属的对立关系。

中西之间这两种不同形态乃至截然相对的世界秩序观,对中国和欧洲各国日后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直接和深远的影响。在欧洲,平行的列国竞争是一种常态,刺激了各国为了生存而扩充和提升军事力量;又为了支撑军事扩张而增加税源,继而又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使国家机器渗透到社会的底层,使整个征税和治理系统走向科层化、合理化、常规化;又为了增加财源而奖励创新,讲求科学,鼓励工商和对外贸易。可以说,平行的国际秩序和常态的帝国竞争,是欧洲各国走向现代化道路的先决条件

和原动力。

不同于欧洲各国之间属于同一个文明体,彼此均为同一个国际体系下的成员国,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彼此之间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清代中国与周边朝贡国也自成一体,朝廷与朝贡国以及所有的中国之外国家之间,至少在官方的意识形态上,呈现为一种单向的交流,也就是只有中国的礼仪教化流布于海外,用夏变夷,而不可能是中国向其他国家学习,用夷变夏。在清朝统治者和儒家士大夫看来,通过朝贡体系和有限的贸易往来,把中原文物制度传布到海外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让中国学习和吸收外来的制度和技艺,则是不可思议的。虽然从晚明到清朝前期,从西洋输入的器物乃自天文和数学知识,不乏其例,甚至得到朝廷的重视和实际运用,但总体上,清朝统治精英对任何外来的文化和制度采取了一种高高在上的排拒态度,则是毫无疑问的。

至于清朝为什么会长期维系和坚守这一套垂直的自我中心的世界秩序观,对外来文明的输入在整体上加以禁绝,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在地缘政治上,入关之后的清朝将关内关外和长城内外连成一片,中国从此再也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边患”,尤其是在17世纪中叶消灭了准噶尔汗国之后,清朝在随后的一个世纪享受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长期和平安宁局面。中国以其庞大的疆域和人口以及远远超过周边各国的经济规模和制造工艺水平,建立了在整个东亚地区无可争议的主导地位。直至鸦片战争到来之前,中国不存在任何实质性的外来威胁。因此,朝廷上下乃至整个士大夫阶层,也失去了了解外部世界的兴趣,更谈不上吸收和接纳外部的器物 and 制度。

其次,在财政和经济上,由于17世纪中叶以后不存在重大的外来军事威胁,清朝失去了扩充和提升军备的动力。以八旗和绿营为主体的国防体系,在规模和财力投入上一直维持大致稳定的状态。因此,清朝的日常财政开支,也就是所谓“国用”,在18世纪和19世纪上半叶也大体上稳定,总体上收大于支,每年略有盈余,经年累积,使这一余额足以应付清朝财政的不虞之需。清朝财政的最主要来源是内地十八省的土地税,而来自国内外贸易的关税只占了小头。因此,清朝的治理策略,把重点放在维持农业经济的稳定上面,对于海外殖民和对外贸易不感兴趣,总体上采取了重农抑商的策略。这种策略的根源,就在清朝独特的地缘秩序和财政结构。这跟早期近代以来欧洲各国在列国竞争的压力下,大力推行重商主义,鼓励工商和技术创新,形成鲜明的对比。

最后,在意识形态上。清朝之所以竭力维护以上临下的世界秩序观,限制对外贸易,排斥外来文明,不仅是因为它反映和印证了清朝的地缘政治秩序,也不仅仅是因为清朝在财政上无需依赖对外扩张和贸易以满足其日常开支需求,而且也出自清朝意识形态的内在要求。清朝继承的历代华夏王朝的儒家说教,视皇帝为天子,以儒家的纲常作为天子统治天下臣民的合法性基础。在这种纲常秩序中,清朝的世界秩序

观和处理中外关系的准则,只能是国内君臣关系的延伸,而不能在君臣等级秩序之外另搞一套。事实上,清朝之所以竭力维持中国与周边朝贡国之间的上下等级秩序,正是以此来印证和加强国内的社会政治秩序。因此,清朝对外关系上的垂直型的等级秩序,对国内政治上的君臣等级秩序,起到保护和支撑作用。如果说清朝国内统治秩序中君臣纲常构成其政治文化的内核的话,那么中外关系上的垂直型等级秩序,便是保护这一内核的外壳。一旦这种单向的垂直型的对外关系被打破,外壳被击碎的话,其政治文化的内核也无可避免地受到侵害。^① 对于清朝统治者来说,维持对外关系上的“上国”形象,是巩固国内等级秩序的必然要求。

因此,相较于近代欧洲各国,晚清中国的现代化,有其特殊的前提条件。在欧洲各国,作为民族国家,处于同一个国际体系之内,彼此之间打交道,不存在世界观上的障碍,向周边国家学习,彼此取长补短,相互竞争,是给定的和习以为常的。这些国家搞现代化的前提条件,是要摆脱中世纪权力分散,各自为政,主权隶属于王权,国土四分五裂的状态,形成一个统一的、主权完整的、疆域稳定的国家。中国正好相反。疆域的统一和稳定,早在 18 世纪中叶就已经完成。中国搞现代化的最大障碍,是突破其世界秩序观的限制,消除上国心态,以平等的姿态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以开放的态度与各国打交道。

事实证明,上国心态构成了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接纳西洋文明的最大障碍。要突破这种心态非常不容易。从鸦片战争结束,到中国情愿以平等的方式与西洋打交道,前后用了整整二十年时间;而真正认识到中国不仅在器物和技艺上落后于西方,必须向西方学习,而且进一步意识到,中国在政教上也落后于西方,愿意在国家体制上向西方学习,变法维新,又花了二十多年的时间。一直到甲午战争战败之后,才转向对思想和制度层面的探讨。现代化启动的缓慢、艰难,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走向现代化道路的一个显著特征。

需要强调的是,晚清中国虽然经历了漫长的现代化启动过程,但对中国现代化的全过程而言,也有其不可低估的贡献。那就是在失去周边的所有朝贡国并且割让部分领土、丧失部分主权之后,总体上依然维持住清朝在鼎盛时期所形成的疆域格局,避免了世界历史上所有其他传统帝国在衰退阶段所共有的疆域四分五裂的状况;在清末民初鼎革之际,进一步将以少数民族群为人口主体的各个边疆区域,与内地各省一道,在“五族共和”的架构下,完整传承给新生的中华民国。换言之,中国的现代化从一开始,就是在“大国”这样一个既有的物理空间基础上展开的。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须进一步探究 20 世纪前半期中国现代化的政治逻辑。

^① 详见李怀印:《中国现代化的挑战阶段(1840—1894)》,胡福明主编:《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第 61—113 页。

三、迈向既大且强(1912—1949):中国现代化的政治逻辑

就国家形成而言,中西之间最大的差异在于,中国在现代化过程启动之前,业已具备一个高度集权、疆域明确的国家。19世纪之前的清朝,虽然还没有引进久已流行于欧洲国家的“主权”概念,也不以平等地位与其他国家相处,但是早在18世纪中叶,清朝的疆域已经趋于稳定,与周边国家的边界也有明确的划定。清廷以行省和藩属两套不同的治理体系,管理内地十八省与满洲、内外蒙古、新疆、西藏和青海等边疆地区。朝廷对内地各省在省级和县级官员的任免、赋税的管理以及军事布防方面,拥有高度统一集中的权力。对于行省之外的各藩属,朝廷虽然不直接介入其内部事务的管理,允许藩属在各方面保留原有的地方治理传统,但是通过军事驻防和宗教庇护等手段,也对边疆形成了有效的掌控和治理。

事实证明这一套治理体系在18—19世纪基本上是有效的。藉由这一套体系,清廷始终能够维持对内地和边疆的控制,消弭内地的叛乱,阻止边疆的分离。但这套体制也有一个与生俱来的弱点,也就是在财政和军事方面缺乏扩张能力,长期处在大体稳定、停滞乃至退化的状态。军事上清朝的正轨军事组织(八旗和绿营)的编制和装备,在整个18世纪和19世纪上半期很少有变化。财政上,清朝的收支水平在18世纪和19世纪上半期也大致稳定,总体上,收略大于支,并且可以历年累计的盈余,应付不时之需,处于一种动态平衡状态。这一套缺乏弹性和扩张能力的财政军事体系,是以清朝的地缘政治的均衡状态为前提的。在西方列强的冲击到来之前,清朝在整个欧亚大陆东部处于独大的地位,其现有的军事和财政能力,足以应付来自周边的任何危险。自从18世纪中叶平定准噶尔汗国之后,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这种危险不复存在,所以清朝也缺少扩展其财政军事能力的外部压力和内在动力。

然而,地缘政治的稳固是相对的、暂时的。一旦外部和内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产生对国防安全和王朝统治的致命威胁,清朝原有的一套财政军事体制便难以应付。这便是鸦片战争以后清廷所面临的困局,同时也是清朝国家发生现代转型的契机。在财政收支结构大体上固化的条件下,清朝应付外来挑战的唯一选项,是在有效维持对省级行政和军事组织的有效控制的同时,允许后者在筹集经费和应对危机方面,有一定的机动能力。其结果便是朝廷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关系形成一种新的格局,姑且谓之“地方化集中主义”(localized centralism)。这种关系的主轴,依然是传统的中央集权。但是在听命于朝廷的前提下,地方督抚在财政用人、军事防卫上,获得前所未有的自主权。这种新的权力格局证明是成功的,它使得同治光绪年间的地方官员在国防教育、交通运输和机器制造等方面的一系列洋务举措成为可能,也使得清朝在遭受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重大冲击之后,能够续命近半个世纪,开启从传统疆域国家向近代主权国家的过渡,并且基本上保持其疆域格局的大体完

整,成功地将清朝的疆域基本完整地传承给取代它的民国政权,避免了世界史上王朝衰落过程中经常出现的国土四分五裂的局面。应该说,这是晚清中国现代化的最为成功之处。

但是地方化集中主义的成功运作需要一个前提条件,即地方督抚对朝廷的忠诚和对国家的认同。而这种认同又是以地方化过程中区域集团所掌控的资源和利益获得朝廷的尊重为前提的。所以在太平天国之后的几十年间,朝廷与地方之间一直维持着微妙的平衡。清末十年朝政的最大失败,就在清廷对满汉关系以及朝廷与地方督抚的关系处置失当。清廷在“新政”名义下所进行的一系列集权举措,严重侵犯了地方领袖的既得利益,导致后者离心离德和清朝的最终覆亡。

民国早期(1912—1927)的政治格局与晚清时期的最大不同,在于“集中化地方主义”(centralized localism)成为权力竞争的主导模式。之所以谓之集中化地方主义,是因为地方主义此时构成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主轴。控制一省或数省地盘的区域性军事领袖(也就是军阀)拒不听命于中央,完全掌控了地方的财政军事和行政资源,并且为了争夺这些资源,相互之间展开竞争。而这些区域性政权是否能够在竞争中胜出,击败对手,最终统一全国,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区域内的财政军事集中化程度。事实证明,最终击败所有对手的,是在财政军事资源最为雄厚的国民党政权;它首先在广东一省打造了一个高度统一集中的地方政权,继而通过北伐战争,打败或降服各省军阀,于1928年宣告完成全国统一。但是在统一过程中以及统一之后,国民党政权并没有能够随着军事上的成功,将其高度集中统一的财政军事体制,从区域推向全国,形成全国范围的集中主义,而是在扩张过程中,将部分竞争对手加以收编,并允许后者保持高度的自主。所以,1927年以后的国民党政权,远未能建成一个统一集中的全国性政权,而是倒退到“半集中主义”(semi-centralism)。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势力,之所以能够在与国民党政权的长期内战中最终获得胜利,有多方面的原因。1945年以后出现的有利的地缘政治环境固然是一个关键因素。日本的投降和苏联红军对东北的占领,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得以进入并最终控制了东北这一中国现代交通和现代工业最为发达、人力物力资源最为充沛的地区,从根本上扭转了长期以来根据地均局限于交通不便、贫瘠落后的边远地区的局面,从而有足够的财政军事资源,展开大规模运动战和阵地战,与国民党部队一决高下。但同样重要的是根据地的内部政权建设,尤其是通过延安整风和军政建设,消除了存在于各根据地的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打造了全党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及其政治纲领的高度认同,并且在此基础上,形成渗透到乡村底层的强大动员能力和各根据地之间的高度协调能力。正是这种“全方位集中主义”(total centralism,亦即高度的政治认同与高度集中的财政军事体制)与有利的地缘环境的

结合,保证共产党革命在抗战结束后短短数年便取得出乎世人预料的胜利。^①

概言之,作为政治现代化的第一步,也是最为关键的一步,19至20世纪中国的现代国家形成,走了一条不同于绝大多数欧洲国家的道路。近代欧洲国家的出现,通常都源自传统帝国的衰退和瓦解。正是在军事帝国或殖民帝国四分五裂的基础上,各国以共同的语言、血缘或文化为纽带,形成新的民族国家,再经由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路径,形成高度统一集中的财政军事体系。而中国在19世纪中叶启动现代化进程之际,已经是一个拥有固定疆域、行政体系高度集中的大国。因此,晚清和民国时期中国向现代国家的转型,并没有经历欧洲史上所常见的帝国四分五裂和诸多民族国家从中崛起的断裂过程,而是从一个统一的、多族群的传统大国向现代主权国家平稳过渡的连续过程。

这场转型的困难之处在于,清朝国家权力的统一和集中始终建立在脆弱的地缘政治均衡和财政均衡之上。19世纪中叶以后,外来军事入侵和大规模内乱的反复冲击,最终打破了这种均衡。原先高度集中的财政军事机制不可避免地朝地方化或区域化的方向滑行。如何克服地方化趋势,实行财政军事资源的重新集中,便成为国家转型的最主要内容。进入民国以后,这种重新集中过程经历了前述三个步骤,即北洋时期的集中化地方主义、国民党政权的半集中主义,以及共党政权的全面集中主义。每个步骤都是对此前的权力结构和资源控制机制的否定,并且在此基础上迈向更集中化的集中化。竞争中的各支势力只有打造比其对手更加统一集中的财政军事机器,并且在意识形态上达到更集中化的认同,才能战胜自己的对手,进而将一个高度统一集中的财政军事组织从局部推向全国,形成全国范围的高度统一集中的现代国家。这便是现代国家在中国形成的独特路径。

总之,要全面客观地理解19世纪以来中国政治变革的独特路径,要抓住以下两点。其一,不能用习见于欧美近代历史的“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套路,来理解近代中国历史;晚清和民国时期的中国所发生的,是从一个多族群的疆域国家向现代主权国家的转型过程。其二,不能把经过这场转型所形成的现代中国,简单地等同于欧美历史视角下的“民族国家”。欧美历史上经过“从帝国到民族国家”所产生的现代国家,普遍具有“既小且弱”的特征:谓其“小”是相对于从前的帝国而言;谓其弱是指这些国家的制度建构,大都基于“强社会、弱政府”的理念。中国正好相反,经过历时一个世纪的国家转型所产生的的是一个“既大且强”的现代中国。

四、国家工业化(1949—1978):中国现代化的经济逻辑之一

如果说,晚清和民国时期中国现代化的主题是国家建造,整个过程充满动荡和冲

^① 详见李怀印:《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

突的话,那么 1949 年完成建国任务之后,从事和平建设,亦即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改造,便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全新主题。

1950 年代至今历时 70 多年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可分为两个截然不同又紧密相连的阶段。在头一个阶段,也就是从 1949 年到 1978 年,中国所追求的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工业化”战略。在从 1980 年代开始全面启动的第二个阶段,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发生根本转变,从原来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通过国家自上而下的计划管理,打造一个高度自主的、部门齐全的现代化工业体系,转变为在公有制和其他多种形式所有制并存的基础上,通过市场机制,尤其是吸引外资和鼓励民间创业,使中国经济最大程度地融入国际市场,从而扩大产量,提高效益,并驱动各产业部门转型升级。

如何评价中国经济增长的上述两个阶段,对认识和评估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及其成就至关重要。由于 80 年代以来的一系列改革开放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此前 30 年的经济体制和战略,因此改革时期的主流话语大多通过前后对比,肯定和颂扬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

要公平、客观地评估 1949 年以后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不能脱离历史实际,简单地进行比较,而必须回到当时的中国所处的外在环境和内部条件,从历史的角度加以解读。首先,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1949 年建国之后,虽然百废待兴,但就人口规模、国土面积和经济体量而言,新中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国,领导人始终有着大国的政治担当,毫不迟疑地认为“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① 正因为这样的大国抱负,新中国的领导人在制订经济现代化方案(“国家工业化”)时,从一开始便理所当然地追求一个与中国的大国地位相称的战略目标。这个目标便是建设一个独立自主、部门齐全、相对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

追求这样一个目标,当然并不排斥在特定地缘政治环境下寻求外来援助。50 年代由苏联援助的 156 项重大建设项目,便是这一时期的具体成果。但这些项目服务于一个战略目标,就是在中国建成一个自主的工业体系,而不是在技术、资本和市场形成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体系的依赖。相反,中国在接受苏联援助的同时,刻意避免参加苏联所主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互助委员会,仅仅是以观察员身份介入该组织的活动。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有着区别于中小国家的发展战略。中小国家可以通过参与国际分工,以让出自己的市场和资源为代价,获得大国的援助和保护。但新中国领导人的大国战略,注定了 1949 年以后的中国不愿意在这样一个国际体系内部只扮演普通成员的角色,或者只是以配角的身份接受大国的支配。事实上,中国之所以从 50 年代与苏联结盟,到 60 年代走向竞争和冲突,最终在边境以兵戎相见,一个原因是中国的大国抱负,与苏联所构想的以苏为首的社会主

^① 《毛泽东文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56—157 页。

义国家体系格格不入。

当然,1950—1970年代的中国,更不可能像中国周边的中小型经济体(东亚四小龙)那样,在政治和军事上仰赖美国的霸权,在经济上加入美国所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接受美国的资金和技术援助的同时,参加这一体系的内部分工,利用国际市场发展,从发展劳动密集的低端产业入手,逐步向中高端产业转型升级。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的中国,在遭受西方禁运和封锁的条件下,与西方各国的贸易往来几乎被切断。即使在70年代初中美关系解冻之后,中国也只能通过个别渠道,与日本以及欧美个别国家展开有限的贸易往来。因此,这一时期,中国游离在西方所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之外,不可能模仿或重复四小龙所走过的道路。中国与四小龙之间,无论在外部环境、内部制度,还是在经济规模和发展战略上,都不具有可比性。如果硬要以四小龙的“成功”经验,反证这一时期中国经济战略的“失败”,那么,这种做法不仅在方法论层面是非历史的,在实证层面也站不住脚。

那么,到底应该如何评价这30年所走过的历程?首先,毫无疑问,这三十年走了不少弯路。新政权的领导人对于在尽快短的时间内使中国走上工业化道路,从来不缺激情和想象,但是却缺少实际经验。急切的目标与经济的贫乏结合到一起,必然带来全国范围的动荡和对资源的巨大浪费。这便是大跃进的前因后果。而它的后续震荡,则直接导致十年“文革”。无论就规模还是冲击力度而言,这些都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试验,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但是如果只用“失败”和“灾难”形容这三十年,无疑将复杂的历史现象简单化了。

检视、判断这三十年是成功还是失败,一个基本的尺度,是看当时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搞国家工业化,有没有一个更好的、可替代的发展模式。首先要明确,冷战时期四小龙在美国霸权的主导下所走的出口加工和转型升级道路,在中国大陆不具有可行性。其次,对于苏联式高度集权的、一刀切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国从50年代后期开始,便刻意避开。此后,在整个六十和七十年代,中国一直在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增长战略和经济体制。总的趋势是在收权和放权之间来回试验,不断地向地方分权倾斜;纳入中央集中计划和由中央部门直接管理的企业,占比越来越低。尽管有大跃进和文革时期历次运动的冲击,中国工业经济的增长势头始终没有中断,从1952年国民经济完全恢复,到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在这27年时间,实体经济(也就是当时所用的“社会总产值”)的增幅达到年均7.9%,其中工业总产值年增10.7%。^①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战略和体制并非最佳,但也远非失败。

当然,在缺少外来投资和足够资金积累的条件下,这一成就的取得,必然意味着国家在最大程度上汲取全国各行业的经济资源,也必然意味着最大程度地压缩民众消费水平。其结果便是到70年代末,虽然中国已经初步建成一个比较完整的现代工

^①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3》,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年版,第10页。

业体系和交通体系,但是城乡民众的收入水平仍然很低,远远落后于周边各小型经济体。但是要全面评估这一时期的经济建设,不能光看人均收入,更不能仅看人均 GDP,因为人均 GDP 这一指标,只对衡量一个市场经济的发展程度有意义,因为只有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经济体内部的所有资源和产品才具有充分的商品属性,可以其市场价格加以核算。而在非市场经济条件下,虽然有“工农业总产值”这一指标,但还有相当多的产品、资源和服务,并不具有商品属性,无法用更为完整的 GDP 这一指标加以衡量。

“四小龙”在冷战时期经济上的快速发展,与其说印证了现代化理论判断(也就是任何一个传统农业社会,都具有按阶段、分步骤向现代化社会转型的潜力),不如说是一个特例。它们的成功是两种特殊因素结合的结果:一是作为在地缘政治上对美国最具战略价值的地区,在资金、技术和市场融入方面,获得美国的全力援助;二是这些东亚社会自身的文化传统,尤其是在儒家文化影响下形成的勤劳节俭的经济伦理和对教育的高度重视,有助于形成一支理想的劳动力大军和全社会的高储蓄率。这两个条件的结合,在冷战时期的所有非西方社会当中,是独一无二的。也解释为什么东亚四小龙成为在 20 世纪非西方社会当中仅有的现代化取得成功的案例。它们的市场经济在融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后,也的确可以用这一体系内的经济增长主要指标,即人均 GDP,来衡量其发展水平。

因此,如果一定要将中国与其他国家加以对比的话,不应该以这样的特例为参照,而应该跟东亚以外的普通发展中国家进行比较,主要是南亚、东南亚和非洲国家,尤其是其中人口规模较大的国家。就人均 GDP 而言,中国在 1977 年达到 390 美元,超过印度的 150 美元,越南的 160 美元,巴基斯坦的 190 美元,印尼的 300 美元,埃及的 320 美元(当然远远落在东亚“四小龙”之后,包括韩国的 820 美元,中国台湾地区的 1170 美元,中国香港的 2590 美元,新加坡的 2880 美元)。^① 但如前所述,人均 GDP 对于非市场经济国家不太具有指标意义。更重要的还是要看更具有实际意义的发展指标。其中最重要的是人均预期寿命。到 1977 年,中国已经达到 64 岁,超过所有低收入国家(平均 50 岁),也超过绝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平均 60 岁)。^② 再看死亡率,1977 年中国为千分之 9,相当于工业化国家的平均水平(千分之 9),低于几乎所有低收入国家(平均千分之 15),也低于绝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平均千分之 11)。^③ 另一个重要指标是成人识字率,1977 年中国达到 66%,高于所有低收入国家(平均 50%),也超过绝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平均 65%)。^④ 总的来说,放眼整个第三世界,1949 年以后的三十年间,中国经济建设所取得的成就是靓丽的。

① The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79,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126-127.

② 同上, pp. 166-167.

③ 同上, pp. 160-161.

④ The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82,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154-155.

五、改革开放(1979年以来):中国现代化的经济逻辑之二

8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发展历程中一个不可思议且堪称奇迹的地方,就是原先作为冷战时期非西方经济发展特例的四小龙的成功经验,居然很大程度上被中国大陆吸纳,并且在更大规模上推展开来。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奇迹,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一是中国的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过去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长期对抗,因而被排斥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贸易体系以及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之外,一变而成为与美、日、西欧走近的国家。从此,中国打开国门,向西方国家开放,而西方国家也越来越多地接纳来自中国的商品和人员交流。中国经济加入西方主导的世界贸易体系,从此成为可能,实际上也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主要目标。2001年底,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则是这一对外开放战略的最重要步骤。

二是东亚四小龙到80年代已经基本完成工业化的转型升级,从原来的劳动密集的制造业升级到技术和资本密集的中高端产业,因此亟需将原有的低端制造能力向外转移,而中国大陆的对外开放恰好与四小龙的这一转型期对接,成为它们对外投资的最佳目的地。源源不断的外来投资,为中国制造业的加速扩张提供了重要推动力。

三是从1979年开始试验、并且在随后两年推广到全国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分田到户取代原来的集体化农业生产组织。亿万农民在获得承包土地的自主经营权之后,开始越来越多地离开土地,纷纷进入乡镇企业或外资、合资企业,为沿海地区制造业的迅速扩张,提供了所需要的劳动力大军。

正是这三个因素的同时出现和奇妙结合,导致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经济的快速扩张,带动各行各业全面融入世界市场体系,成为全球产业链的重要环节。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引进自美国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在结合中国的经济实践之后,形成在中国经济学界颇具影响力的一个学派。按照这一学派的解释,无论是四小龙在六七十年代的起飞,还是中国大陆特别是沿海地区在八九十年代的工业化,都是因为利用了自身的比较优势,主要是廉价的劳动力和具有竞争力的基础设施,从而成功地吸引了外来投资和技术引进。进入新千年之后,随着中国经济全面融入全球化进程,中国的产业结构和出口商品构成也在逐步发生变化,从八九十年代以劳动密集的粗加工产品和原料出口为主,上升到以资本和技术密集的中高端产品为主。换言之,2000年以后的中国完成了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比较优势理论是有一定的适用性和解释力的。但是,这种理论的解释力也仅限于此。事实上,不仅四小龙的崛起有其特殊的地缘政治和文化传统因素,几乎无法在东亚以外的地区加以复制,而且中国大陆历时三十多年的快速崛起,也是前述三种因素奇特结合的产物,同样在中国

大陆以外地区无法复制。实际情况是,90 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工业化及其对全球市场的占领,放眼整个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可谓一枝独秀。在中国经济迅速崛起、人均 GDP 快速上升的同时,其他发展中国家所经历的,则是长期的停滞和中等收入陷阱。

过去经济学界对中国经济奇迹的解释,长期以来大致上归结于以下两种因素。一是市场机制的引入和产权制度的变革,导致中国的经济体制和所有制结构发生根本变化。应该说,相对于此前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公有制为主体的产权结构,市场机制和私有产权的确为改革以后的中国经济注入活力,驱动了中国经济增长。但是无论市场经济,还是私有产权,在 1949 年以前的中国早已有之,而且在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同样存在。但无论是 1949 年以前的中国,还是战后第三世界国家,并没有因为市场和私有产权的存在而实现经济起飞。可见市场机制和私有产权最多只能说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但绝非最关键因素,更谈不上是充分必要条件。仅仅只有市场机制和私有产权,并不能确保经济起飞和转型升级。

二是所谓比较优势,认为 80 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是因为加入了国际大循环,在全球范围的产业链分工中,找准、站稳了自己的位置,也就是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尤其是充沛而廉价的劳动力,搞大进大出,从而推动经济增长。换句话说,中国大陆成功地借鉴了东亚四小龙的起飞模式和比较优势战略。这种模式既不同于 80 年代之前第三世界国家所青睐的追求小而全或大而全的进口替代战略,也不同于 90 年代以来流行的新自由主义方案,只重视自由竞争和产业保护,听任跨国公司占据国内各行各业的支配地位。比较优势战略所强调的是各国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有所为,有所不为,并且在发挥比较优势的同时,积极主动实现产业升级。

但比较优势理论也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它的预设前提并不是给定的、无条件的、到处适用的。这个预设前提就是,一个国家或经济体在全球范围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可以不受限制地与其他任何一个国家进行贸易往来,具有商品属性的资本和技术可以在国与国之间自由进出。但实际情况是,地缘政治,而不是纯粹的市场机制,在国际贸易体系中发挥了关键的乃至决定性的作用。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大国,总是利用自己的军事、金融和技术优势,使用非经济、非市场的手段,对任何具有潜在威胁和竞争能力的国家或公司,进行打击和排挤。只有对某些在其全球战略中起关键支撑作用的盟国,霸权国家才会网开一面,允许后者引进或开发尖端技术,并且使之产业化,但前提是这种高端产业的引进和研发不会对其霸权地位构成威胁,并且只能作为维持和巩固其霸权地位的有益补充或辅助角色而存在。一旦构成威胁,即使来自盟国,也毫不留情地加以打击。四小龙 80 年代的产业升级和 90 年代以来尖端制造业的崛起,正是在这种前提下实现的。中国从 80 年代开始之所以获得历时三十年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这一时期中国的市场特征和产业定位,与大国主导的世界产业链具有兼容性,满足了发达国家低端产业外移的需求,

使跨国公司的资本投入集中于高端产业,从而获得利润的最大化。与此同时,大量来自中国的低端廉价商品的涌入,也有效地抑制了西方各国尤其是美国的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有助于这些国家维持国内社会的总体稳定。

但是自从进入新千年以后,中国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两大趋势,使得比较优势战略难以为继。首先是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势头十分迅猛,尤其是在新经济领域,包括5G 通信技术、可再生能源、机器人和自动化技术、电动汽车、无人驾驶等等,中国的赶超速度令人惊讶,甚至在个别领域遥遥领先,从而对美国所主导的科技霸权以及由科技霸权所支撑的军事和金融霸权,构成现实的、直接的威胁。其次是中国的外交战略也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如果说在80—90年代乃至21世纪头十年,中国所奉行的是韬光养晦、决不当头的策略,在处理国际关系方面认可美国的霸权地位甚至加以利用的话,那么,随着中国对外贸易和海外投资的扩张,中国的国家利益也在不断地向外延伸;随着总体国力尤其是财政和军事能力的上升,中国急需重构自己的地缘战略,使其对外战略在最大程度上服务于不断向外延伸的国家利益,从而也不可避免地与美国在东亚地区所建立的地缘秩序和军事战略发生冲突。阻挠、限制、遏制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升级和突破,也成为美国对华战略的重中之重。在这种情况下,沿用比较优势战略的传统思路,通过资本和技术自由流通,实现产业升级,已经走不下去。至少在高端产业领域,全球化已经开始退潮。比较优势战略至此也走到了尽头。

总之,到本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已经进入关键阶段。探索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也成为中国知识界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挑战。不仅经典的现代化理论早已过时,久为学界所遗弃,而且90年代以来曾经兴盛一时的全球化理论也已经成为明日黄花。那么,除了“现代化”和“全球化”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分析工具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展望未来,中国的竞争潜力到底在哪里?中国是否有可能完成现代化,加入发达国家的行列?

六、走向成熟:中国现代化的经济逻辑之三

如前所述,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只有两类经济体成功完成现代化转型。其一是日本和东亚四小龙,靠的是它们在冷战时期东西方对峙中的特殊战略地位,以及由此所获得的美国在财政、技术、贸易、军事、政治上的全面扶植。当然,其内部在“发展型政权”(developmental state)主导下所形成的外向型战略,以及当地民众在传统文化影响下所形成的刻苦勤俭、崇文重教的价值观,也对工业化的成功起飞起到不可或缺的推动作用。其二是欧洲六小国,即北欧的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以及东欧的捷克、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这些国家因为较早加入欧盟(2004),文化上与已经现代化的西欧和北欧国家相近(基督新教路德宗或者罗马天主教),地理上相邻,因此,在加入欧盟之后,可以轻易引进来自西北欧和南欧发达国家的投资和技

术,并且在金融和贸易体系方面与欧盟完全融合,从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升级和国民收入的提高。而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比六小国大得多的其他东欧国家,包括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尽管也已经加入欧盟,但体量较大,很难一下子被欧洲发达国家的经济体系所吸纳。不过,相较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上述东欧国家中已有三个(波、匈、罗)进入向发达国家过渡地带(人均 GDP 在 13,000 至 20,000 美元之间)。它们能否成为下一波加入发达国家行列的成员,尚拭目以待。

中国的人均 GDP 在 2022 年达到 12,500 多美元,在“上中收入”国家中名列前茅。问题是,中国经济在今后一二十年的时间内,能否继续保持增长的态势,跨过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峡谷,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全面现代化?

毫无疑问,在经历了 40 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从 2020 年开始,由于三年新冠疫情的冲击,中国经济的增长势头急剧下降,从过去年增 7% 乃至 10% 以上,急剧跌至 2020 年的 2.3%,2021 年反弹至 8.1%,但是到 2022 年再次下滑到 3%。2023 年估计也仅在 5% 左右。疫情的结束并没有带来经济增长势头的恢复。相反,伴随着经济增长疲软,各行业的就业机会也在减少,失业率居高不下,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支出也呈下降趋势。曾经作为地方政府财政最主要来源和地方实体经济最主要支撑的房地产业,由于民众的购房意愿和还贷能力下降,也失去了往日的繁荣。

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前景似乎也黯淡下来。自从美国总统特朗普 2017 年上台之后,美国频繁地对中国发起贸易战,通过大幅提高关税,限制中国商品大规模进入美国市场。2021 年拜登总统上台后,进一步强调在对外贸易上与中国“脱钩”,减少对中国商品的依赖。与此同时,美国还联手其在欧洲和东亚地区的盟国,在涉及 5G 通信、人工智能的尖端科技领域对中国展开制裁、断供和封锁。中国国内的高端芯片设计、研发和制造产业受到严重挫折。多年以来中国对外贸易持续扩张的势头也减缓下来。到 2023 年上半年,中国已经从原先美国的第一大进口国,下降到第三位,落在墨西哥和加拿大之后。基于这些新的情势,西方媒体已有言论认为,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中国有可能重蹈日本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覆辙,陷入长期萧条状态,甚至会步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后尘,掉进“中等收入陷阱”。不少经济学家原本认为,中国凭借其现有的增长势头,可望在 2035 年前后在经济总量上赶超美国,现在这种前景已经变得遥遥无期,可能永远也赶不上。

的确,中国在疫情期间和后疫情时代面临多重困难。其中有些是短期的、暂时的,包括疫情对服务业的冲击所带来的就业机会和居民收入水平的下降,以及由此所引起的普通消费者减少开支和市场不景气现象。有些则是长期的体制性因素所引起的,尤其是多年以来一直构成地方财政主要支撑的房地产业,由于总体规模的过度扩张和商品房价格的严重泡沫,已经难以为继,而失去最大财源和融资渠道的地方各级政府,背负规模庞大的地方债,也已构成当地经济正常运转和扩张的最大隐忧。此外更有地缘政治环境因素,特别是发达国家对中国在中高端产业领域转型升级势头的

联手打压,对中国经济增长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是十分深远和不可低估的。

尽管如此,中国拥有普通中小发展中国家所不具备的一系列大国优势。长远来看,这些优势对今后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仍将会起到有力的支撑作用。

首先是地缘优势。中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在数千年的历史上,早已形成根深蒂固的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无需像地域狭小、资源贫乏的欧洲国家那样,仰赖对外扩张、掠夺、殖民或海外贸易。这是因为中国的内地,尤其是华北、华东和东北地区,有广袤的平原,气候温润,土壤肥沃,适宜农耕。而千百年来形成的密集型农耕文化,使华夏民族能够以其有限的耕地繁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人口。今天的中国依然强调保护耕地,以密集型农耕方式,确保 14 亿人的粮食自给和生计安全。因此,即使今后发生极端的地缘政治态势,也就是失去所有对外物质交流的渠道,中国依然可以凭靠本国的丰富资源和齐全的产业部门,维持整个民族的生存。对于那些已经被深度卷入全球化过程、高度仰赖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中小型国家来说,要做到这一点,几乎是不可能的。

其次是规模优势。首先是地理规模,也就是辽阔的国土及其所带来的经济多样性。如果说在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靠“国际大循环”,也就是对外贸易和外来投资的拉动的話,那么,在国际地缘环境和贸易形势骤然变化的情况下,把发展战略的重心转向国内,利用东、中、西部三个不同经济带之间的发展落差,实现国内大循环,将会为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其次是市场规模。中国国内市场的优势,不仅在其规模之大,足以媲美整个欧洲经济共同体或者北美自由贸易区,更在于它的整合程度之高。所有参与市场的生产者、营销者和消费者使用同一种语言、同一种货币,地区之间没有任何贸易壁垒,整合程度远远超过欧盟或北美自贸区,从而大大降低了生产和经营成本,吸引了几乎所有的跨国公司来华寻找投资的机会。与此同时,在国家产业政策的保护下,庞大的国内市场也在短短一二十年间孕育出众多在生产规模和技术水平上足以与同行业跨国巨头相抗衡的大型企业,这在互联网时代的新经济领域尤为突出。这些企业不仅在国内独占鳌头,而且在国际上也具有强大的竞争力。庞大的国内市场是这些企业赖以进行积累资本、形成技术优势并成功走向世界的最重要基础。

三是人力优势。中国不仅有庞大的人口规模所带来的众多劳动力,更重要的是劳动力素质高于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的一般水平。重视教育所带来的劳动者整体素质的提高,农耕文化所孕育的勤勉节俭的生活态度,以及集体取向的价值体系所塑造的非个人中心的行为规范,这三种特性的结合,使中国的劳动力大军在总体上更能满足现代企业的竞争需求,也是支撑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优势的坚实基础。

四是体制优势。起步晚的经济体要成功赶超先进工业化国家,通常须有政府的介入,包括引导投资方向的产业政策、市场保护、各种间接或直接的补贴,由此形成流

行于战后东亚的所谓“发展型国家”。一旦走过了工业化起步阶段,在科技上实现了赶超先进国家的任务,国家便退出经济领域,让位于私有化和民营化。近几十年来中国的实践,进一步突破了“发展型国家”的理念。相较于东亚其他经济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体制的最大特色,不在于经过 90 年代中后期的企业改制和长期的招商引资,民营和外资企业早已取代原有的国营和集体企业,贡献了中国经济总产值的大部分份额,而在于它承袭了 1949 年以后形成的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的经济基础,由中央或地方各级政府直接拥有国民经济关键行业的关键企业。这些企业的管理体制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依然带有计划经济时代的特色和由此所产生的弊端,但总体上已经融入整个市场经济体制,并且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转起到有效的调节作用。其最大优势在于让关键行业的关键企业超出对企业本身利益和短期效益的考虑,在投资目标和发展方向上,立足于全社会的长远利益,以牺牲个别企业乃至个别部门利益的方式,换取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这是在欧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任何一个国家是无法做到的。至于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更是这一体制优势的集中发挥。也就是对于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项目,或者事关国家竞争力的尖端科技和研发,在单个企业无法独自承担、短期内无利可图的情况下,由国家集中财力,重点投入协调各部门人力和物力资源,制定长远规划,有步骤地攻坚克难,最终达到既定目标。^①

上述各项优势,将对中国经济在从过去的高速增长转入“走向成熟”的全新阶段之后维持长期增长的势头,起到不可低估的支撑作用。乐观估计,凭借自身的规模优势、一流的基础设施、城市化的持续推进、政府宏观调节政策的作用等因素,在 2030 年之前,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应该能够维持在 5% 左右;中国的人均 GDP 也将从 2021 年的 12,500 多美元,增加到 2030 年的 20,000 美元,从而进入发达国家的门槛;如果经济增长受到难以预料的重大事件的干扰,最晚可能要拖到 2035 年才能达到这一目标。

从 2035 到 2050 年,日趋成熟的中国经济将进一步放缓增长势头,但依然能够维持 3% 到 5% 的增长率。虽然城市化的驱动作用将大大降低,但其他因素将共同驱动中国经济继续成长。如果说在 2035 年之前,中国在高、尖、新技术的研发上仍将面临核心国家的联手围剿以及由此所带来的瓶颈的话,那么,2035 年之后,这种瓶颈的限制效应将越来越小,中国在高端制造业的技术创新将进入喷发阶段,在诸多行业形成全球范围的竞争优势,带动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快速上升。随着出生率的下降,中国的人口规模将有所缩小,人均 GDP 的增速将超过 GDP 总量的增速。到 2050 年,中国的人均 GDP 有可能达到 50,000 到 60,000 美元,从而进入高度发达国家行列。中国的“现代化”将走完全程,从此进入“后现代化”时代。

^① 详见李怀印:《跨越“中希大峡谷”:中国的现代化何以可能》,《江海学刊》2023 年第 6 期。

七、反思：全球视野下的“现代化”

流行于冷战时期西方社会科学界的“现代化理论”(modernization theory),力图使人们相信,当今世界的所有国家不分大小,也无论先进与落后,都会经历一个从传统的、前近代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无论西方还是东方或南方,都有走向现代化的潜力和前景。在这些理论家看来,经济落后的国家,只要通过不断的、渐进的改良,健全基础设施,吸引足够的资本和技术投入生产过程,并且通过提高教育水平,培养一支合格的劳动力大军,就能按部就班地分阶段完成工业化,并完成整个社会的现代化的道路。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W. W. Rostow)就此提出有名的经济成长阶段论。^①他在欧美国家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把现代经济增长分为五个阶段,认为这五个阶段的增长模式,适用于所有致力于现代化的非西方国家。

实际情况是,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整个非西方世界,真正完成现代化转型的国家和地区寥寥无几,且集中在东亚地区,包括20世纪70年代完成现代化过程的日本,以及80年代的“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的台湾和香港地区)。21世纪头二十年,东欧边缘地带的六个小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在加入欧盟之后,其国内市场和整个经济体系被迅速带动起来,加入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人均收入大幅提高,也进入发达国家的门槛。

上述这些国家和地区,加上较早实现现代化的欧洲国家,包括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等北欧、西欧和南欧地区,以及欧洲人在海外的移民所形成的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总共仅占全世界人口的约17%。

剩下的国家,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中东地区的几个石油输出国,人均收入很高,医疗水平和人均寿命也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是在社会整合、政治参与以及文化世俗化程度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相当的距离,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国家。

第二类是低收入(low income)国家,以2021年的数据做参照,人均GDP在800美元以下,一共14个,集中在亚洲和非洲,属于典型的不发达(underdeveloped)国家。

第三类是介入不发达国家与发达(developed)国家之间的所谓发展中(developing)国家。这些国家分两种情况,要么在1990年至2021年的整整30年间,人均GDP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增长,基本上停留在原有水平(如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巴西、伊拉克、伊朗、南非、俄罗斯和乌克兰);要么在这一时期的头二十年(1990—2010),经济有所增长,但幅度很慢;后十年(2011—2021)则停滞不前。这些国家有一个共同特征,即经过几十年的工业化,经济已经上了一个台阶,脱离了低收

^① W. W. Rostow,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

入国家的不发达状态;但一旦登上这个台阶,整个经济便长期停留在既有的水平上,徘徊不前,甚至有所下降,很难再上一个台阶,进入发达社会。它们的经济处境,常被学界描述为“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 trap)。

中国是所有中等规模以上(人口在 3000 万以上)发展中国家中唯一长期保持经济增长的国家,从 1990 年的 905 美元,跃升到 2021 年的 12,556 美元,平均年增 8.8%,上升速度最稳、最快,从起初在中等人口规模以上的中等收入国家当中垫底的地位,跃居到这些国家的第一名。只要中国在今后 5—10 年内能够维持 5%左右的增长速度,那么在 2030 年前后,达到人均 20,000 美元以上,加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便有很大的确定性。

那么,为什么有些国家能够成功地实现现代化,加入发达国家或地区的行列?而更多的国家却依然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奋争,甚至根本还没有“化”起来?如果中国的人均 GDP 能够在 2030 年(或最迟 2035 年)达到 20,000 美元,从而加入现代化国家的行列,对理解全球范围的现代化运动,到底有何启示?

面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绝大多数新兴国家工业化步履维艰、长期陷于低收入和中等收入陷阱的事实,西方现代化理论家的回应,多是倾向于在非西方社会内部找根源。认为是这些国家的文化传统与现代化的要求格格不入,其社会氛围也不利于企业家精神的培养和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例如,在信奉文化决定论的美国文化学者哈里森(Lawrence Harrison)看来,拉丁美洲国家之所以没有发展起来,是因为这些国家相信天主教,继承了西班牙文化传统,缺乏新教伦理所带来的理性主义。他认为,拉美国家的文化特征,总的来说具有“反民主、反社会、反进步、反企业精神,以及至少在精英阶层中间反工作”的浓郁色彩。^① 拉丁美洲的经济落后和停滞,主要原因不在外部因素特别是美国的影响,而是这些国家本身的社会文化传统出了问题。

与西方学者把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失败或成功归因于这些社会的内部传统相反,非西方国家的学者多倾向于把本国的不发达或者现代化的失败归咎于不利的外部环境。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曾经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风行一时的“依附论”(dependency theory)。该理论的倡导者多来自拉丁美洲和部分非洲国家。在他们看来,亚非拉国家之所以贫穷落后,是因为它们在历史上长期遭受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榨和剥削,变成西方的原料供应地和商品倾销市场。二次大战之后,这些国家纷纷独立,但经济上依然受制于欧美国家的跨国公司,对西方的资本、技术和市场形成依附。因此,依附论学者认为,非西方国家走向经济繁荣的唯一道路,是切断与西方国家的联系,走独立自主的民族经济发展道路。但是在实践上,这一方案很难行得通。道理很简单,普通中小国家不可能关起门来搞建设。搞小而全,成本太高,代

^① Lawrence Harrison, *Underdevelopment Is a State of Mind: The Latin American Case*, Lanham: Madison Books, 1985, pp. 165.

价太大。除非得到大国的倾力支持,否则即使搞起来,一时有起色,也难以为继。

这种激进主义方案的改良版,是拉美国家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所践行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也就是通过壮大本国的制造业,减少并最终取代对进口商品的依赖。而在这种战略背后起支撑作用的,则是美国社会学家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理论”(world-system theory)。按照这一理论,居于世界体系主导地位的“核心国家”与贫穷落后的“边陲国家”之间的分工和差异并不是绝对的和固定不变的。在这两者之间,存在一个过渡性的“半边陲”地带。通过发展制造业,可以让边陲国家进入半边陲地带,甚至可以随着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市场融入而加入核心国家的行列。^① 依附论与世界体系理论相辅相成,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对本国历史的认知和发展道路的选择。

经过二三十年的实践,进口替代战略的确改变了拉美国家的经济面貌,很大程度上推进了这些国家民族工业的发展和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但是到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和 90 年代初,这一战略所带来的问题也日渐暴露。由于这些国家在工业化起步阶段,缺乏足够的资本积累和人才储备,只有靠举借外债和技术引进以及政府的大力提倡乃至直接投入,才能促成工业化的起步。结果进口替代的项目搞成了,但是在保护主义政策的扶持下,由于缺少外来竞争,本国制造业在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方面,远不如进口商品,经济效益难有起色。市场保护和行业垄断也带来政府部门的寻租和腐败现象。更为严重的是,这些国家因为发展民族企业和基础设施而大肆举债,欠下发达国家及其所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的巨额债务。由于长期累积和拖欠而无力偿还,到 80 年代,已经形成席卷整个拉丁美洲的债务危机。作为减轻债务和缓和还贷的条件,在西方债权国的压力下,拉美国家纷纷放弃原有的进口替代战略,向西方资本敞开国门,导致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重新占领主导这些国家的制造业和国内市场。

总之,“现代化”这个学术概念以及与之相伴的各种现代化理论,虽然在 50 至 70 年代欧美知识界流行一时,但是在非西方(尤其是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学术和政治精英中受到强烈质疑。加上整个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界经过战后几十年的自身演进,到 80 年代中后期,已经逐渐转向,各种后现代主义去宏大叙事、去中心、去客观研究成为越来越热的方法,人们对过去这种宏观比较和定量的现代化,再也提不起兴趣;现代化这一术语基本上已经从西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逐渐淡出。

从上个世纪 90 年代开始,“全球化”(globalization)概念流行于西方和非西方各

^①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System: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4; *The Modern World-System II: Mercantilism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1600-175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III: The Second Era of Great Expansion of 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 1730-1840 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The Modern World-System VI: Centrist Liberalism Triumphant, 1789-1914*,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国的经济界和知识界,并且对国际关系和各国的政治经济产生深刻影响。这一思潮的兴起,跟当时西方国家精英集团所信奉的新自由主义理念紧密相关。新自由主义所针对的不仅是发达国家自身的政府干预措施和社会福利政策,还把矛头指向非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战略,亦即前面所讲的进口替代以及与此相关的关税保护、价格控制、投资限制、部门垄断等一系列政策,其背后则往往是具有威权色彩的政府体制。新自由主义对保护主义和威权主义的冲击,加速了 90 年代以来全球化浪潮在世界各国的流行。

现代化与全球化作为两个不同的学术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在意识形态层面,两者之间是相同的,两者都是基于自由主义理念,也就是把经济上的市场资本主义以及政治上的个人权利和自由竞争当作终极目标。从这个意义上,全球化只是现代化的翻新和再包装。但全球化概念又与现代化有显著不同。它超越了民族国家视野,把每个国家都当成世界范围的物质和信息流通网络和流通过程的一部分,认为每个国家都可以通过加入全球经济的产业链分工和世界一体化贸易体系,获得增长和发展的机会;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每个国家可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特征,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并且通过投资和创新,使自身的产业结构不断升级,使自身定位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不断向中高端迈进。国内流行一时的新结构经济学,便是这种全球化思潮在中国经济学界最典型的体现。

但是在实践中,新结构经济学所预设的比较优势和产业升级很难实现。一个基本的现实是,自从 80 年代债务危机发生之后,各国在西方金融机构的压力下,次第放弃保护主义,导致西方跨国公司纷纷进入原先受到保护的产业部门,并迅速占领市场,使这些国家的制造业被锁定在跨国公司所控制的产业链的低端;所产生的大部分利润也被跨国公司转移到西方,使当地社会的民生无法得到显著改善,所谓产业升级更无从谈起。这便是最近二十几年来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现实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最根本原因。

八、总结: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

相较之下,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长期保持平稳增长的态势,中国之所以有条件、有能力走完现代化的全过程,最终加入现代化国家的行列,是因为中国所走的现代化道路迥异于非西方世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走过的道路。

首先,国家形成的道路不同。

亚非拉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是在欧洲殖民帝国解体之后匆匆形成的所谓“新兴国家”,规模较小,人口通常在几百万到几千万,边界的划分具有随意性,很大程度上是殖民时代为方便宗主国的控制而人为造成的,缺少文化或族群认同的牢固基础;在战后风起云涌的建国运动中所形成的国家政权,往往是各武力集团或各政治派系

相互妥协的产物,在强人独裁或虚有其表的民选政府的架构下,长期陷于政变、内战或族群冲突所带来的动荡之中。在这样的状态下,经济建设几乎无从谈起。

相比之下,中国经过 20 世纪上半期的国家转型所形成的是一个高度稳定和统一集中的现代主权国家。它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即前面所说的“既大且强”。“大”是指其领土面积、国土资源和人口规模。这既得益于秦汉以来华夏民族所展现出的强大生命力、涵化力和向心力,更直接受惠于清朝国家在其前期的疆域开拓和整合,中后期的勉力维持,以及终结之际通过清帝逊位诏书,由新生的中华民国以“五族共和”的形式,完整地继承其全部疆域。同样至关重要,在国难最为严重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时期,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展现了强大的团结力和组织上的巨大韧性。“强”是指其内部组织结构。它是对晚清以来权力从中央向地方转移、再到民国初年政治上走向四分五裂的一种回应。应对的方式,是打造一个高度统一集中的政权组织,并且使这种组织从区域逐步推向全国。在相互角逐的各支政治势力中间,只有组织和权力最为统一集中的一方,才能有效地动员和使用人力物力资源,从激烈的对抗和竞争中胜出。在 20 世纪前半期的中国,现代国家的建造过程因此呈波浪式地向前推进,并且环环相扣,最终产生的必然是一个比此前的任何政权都更为统一集中的国家组织。

辽阔的疆域所带来的丰富多样的经济资源,庞大的人口所提供的劳动力大军,强大的国家机器所带来的和平环境和社会稳定,高效运行的行政体制所发挥的有效动员和协调能力,所有这些,都为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现代化,提供了优越的前提条件,使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从一开始便区别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

其次,工业化的战略和成效不同。

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国土狭小,市场有限,资源多样性程度低,无法形成门类较为齐全的产业体系和能够自我维持的经济体系。在殖民地时代,它们的产业结构完全受到宗主国资本集团的控制,具有高度的对外依赖性。独立之后,它们受激进主义经济思潮的影响,要么想切断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纽带,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要么借助西方的资本和技术,实行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但结果都证明不具有可持续性。践行多年之后,要么腐败丛生,要么负债累累,最终不得不对国际资本妥协,在全球主义思潮的冲击下,重新敞开国门,屈从于跨国公司的垄断和国际资本的支配,国民收入长期停滞不前,陷入不发达困境或中等收入陷阱。

相比之下,中国的工业化战略具有高度的自主性和灵活性,在不同的地缘政治环境下,选取最适合自身条件和最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发展战略,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初三十年的起步阶段,以及改革开放时期头二十年的高速增长,中国成功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工业化。工业化的实现,得益于背后的两种相互迥异但又相辅相成的经济体制。前 30 年的计划经济,使中国得以有效地动员和利用全国的人力物力资源,全力从事国家所主导的工业化建设(“国家工业化”)。其目的是在两个超级大国

主导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条件下,确保中国的自主生存和发展能力。通过一整代人的奋斗,中国成功地建立了一个门类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并且形成了足以确保自身安全的国防能力。从 70 年代末开始,中国进入改革开放阶段,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发生根本变化,即利用相对宽松、有利的国际环境和前 30 年所奠定的工业化基础,致力于改变宏观经济调控机制,改造微观经济组织,目标是完成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并且通过吸引外资和扩大外贸,从而带动国民经济快速增长。

到 90 年代末和 21 世纪初,这两个目标均已实现。随着国有企业改制的完成,中国初步形成了一个现代市场经济的制度架构;随着 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中国加快了融入世界经济的速度。中国的经济总量和人均 GDP 也在此过程中突飞猛进,维持长达二十几年的加速增长状态。到 1999 年,第二、三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经从改革之初(1979)的 69%上升到 82%。如果我们把第二、三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比 80%以上,视作工业化的一个基本尺度的话,那么,中国经济的工业化目标,到 90 年代的最后两三年,已经基本实现。

第三,步入现代化经济体的路径不同。

迄今为止,除北欧、西欧、南欧和北美及大洋洲国家集团之外,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或地区成功加入现代化经济体的行列。无论是东亚四小龙,还是东欧六小国,都是依靠全面融入以美国和欧盟为主体的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加入这一体系内部分工和产业链之后,才得以完成其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和走向成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也曾长期受益于加入国际大循环;尤其是在 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对外贸易和外来投资构成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不同于普通发展中国家的是,最近一二十年来中国制造业的扩张,显示了强劲的从低端向中高端升级势头。如果这种势头持续下去,将会对欧美资本所把持的国际供应链的高端产业构成巨大冲击。更令西方国家集团担忧的是,中国不仅是一个规模庞大、上升势头强劲的经济体,而且是一个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坚持独立自主的大国,而不像东亚四小龙或东欧六小国那样,可当作地缘政治上的小伙伴而轻易地加以消化、吸收和利用。因此,中国在世界经济和地缘政治上的影响力的迅速提升,必然引起以美为首的西方国家集团的集体防范和阻拦。除了地缘政治上的拉帮结伙之外,它们还在高科技产品对华出口方面联手限制、断供,试图将中国的制造业限制在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中国是否会因此掉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成为许多人关心的问题。

但中国具备普通发展中国家所欠缺的一系列大国竞争优势。这其中既有数千年来华夏文明的历史演进所带来的内在优势,包括辽阔的疆域及其所蕴含的丰富自然资源,民众对教育的高度重视及其所带来的高质量人力资本,儒家文化影响下所形成的入世精神及其所蕴育的勤劳、节俭的价值观,以及规模庞大且高度整合的国内市场,等等;又有 20 世纪前半期的历次革命运动所造就的高度统一集中的政权体系,及其所展现的巨大动员和调控能力。这些优势汇聚在一起,构成中国所独有的“元实

力”(metapower),即一种源自文明底层且契合现代发展要求的力量,将对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起到强有力的支撑。

不过,现代化过程充满变数。从当下到2035年前后,这十来年将是中国现代化最后半个世纪里面最为关键的一个时段。大国之间的地缘竞争将进一步加剧,来自外部的风险日益增高;与此同时,在现代化后期,民众对改善生活水平的期待急剧上升,对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落差也越来越敏感。所有这些,都带来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不确定性。如果这十来年能够平稳度过,经济上维持5%左右的年均增长率,那么,一如前述,最迟至2035年,中国的人均GDP按当下不变价计算,将达到20,000美元左右。中国将告别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稳步迈入发达国家的门槛。同时,在科技研发上,中国的科技产业将能够摆脱目前的瓶颈,占据全球产业链的上游,与西方科技大国并驾齐驱。与经济社会结构走向成熟相适应,整个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也将水到渠成。

总之,中国的现代化是对现存世界经济秩序的介入与超越的双重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离不开对西方国家所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的依存和借力。在高度融入这一体系的过程中,充分利用自身的劳动力资源和市场优势,在全球产业链的分工中,从劳动力密集的低端产业做起,不懈地向中高端产业推进,曾经是近几十年来中国经济稳健成长、乃至在发展中国家一枝独秀的制胜法宝。但中国的大国地位和强健增长势头,注定中国在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必定遭到来自霸权国家的打压乃至核心国家的集体抵制;一旦进入世界产业链的高端尤其是尖端领域,原有的法宝便逐渐失灵。因此,如何在全球产业链的中高端站稳自己的位置,凭借自身实力,形成不依赖于现存核心国家的竞争能力,将是未来几十年中国的现代化能否取得突破和成功的关键所在。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现代化,将必然意味着对服务于核心国家利益的现存世界经济体系的超越。其意义也将是双重的:在中国这样一个对世界经济和人类福祉具有重大影响的大国实现现代化,不仅意味着曾经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国度最终完成了古老文明的现代改造,让一个自19世纪以来曾经屡遭磨难的民族(不仅在物质文明上而且在政治文明上)重新屹立在世界最先进和最强盛的民族之林,而且是对近几百年来基于西方国家历史经验的现代化模式的突破,意味着西方中心论的终结。在中国这样一个规模如此巨大的国度实现现代化,在人类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它将从根本上颠覆近几百年来由西方核心国家所制造的充满不平等的世界格局,给整个人类文明带来更加公平、安宁和美好的未来。

(责任编辑:周陈)

of Tibetan tea consumption back to Princess Wencheng, deeply believing in this connection and attributing to it numerous beautiful legends. These tales have become a celebrated chapter in the friendship between the Han and Tibetan peoples. The story of Princess Wencheng and Tibetan tea embodies the shared aspirations of the Han and Tibetan peoples for interethnic friendship, reflecting their emotional, value-based, and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It highlights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exchanges, communication, and integration between Han and Tibetan cultures, evolving into a collective memory of mutual emotional resonance and a shared symbol of Chinese culture.

Keywords: Princess Wencheng, Tea, Qinghai-Xizang Plateau, Shared Symbol of Chinese Culture

Feature commentary: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China's Modernization from a Macro-Historical Perspective: Stages of Progress and Path Selection

LI Huai-yin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142)

Abstract: China's modernization began in the mid-19th century when the Chinese people consciously sought a path of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suited to their national conditions, spanning nearly two centuries. This long historical process can be divided into several interconnected stages: 1) The Late Qing Period (Mid-19th Century): The efforts to save the nation and preserve its existence helped late Qing China avoid the colonialization experienced by most non-Western countries and the fragmentation typical of major empires in their decline. 2)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National transformation turned China from a traditional territorial state into a highly unified and centralized modern sovereign nation. 3) The Second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Building on the "large and strong" foundation laid in the previous stages, China completed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its entire national economy. 4) The First Half of the 21st Century: In the "maturation" phase, China will complet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its industrial structure by leveraging a series of advantages in geography, scale, labor force, and institutional frameworks. It is expected to maintain steady economic growth, reach the threshold of developed countries around 2035, and ultimately join the ranks of highly modernized nations by the mid-21st century. The success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lies in its historical starting point, the path of its nation-building, the industrialization strategy, and the route to becoming a modern economic entity, all of which differ from the majority of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Keywords: Modernization, Globalization, Industrialization, Nation-building, Middle-income trap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on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From "Modernization Theory" to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YU Zhi-zhong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Hsinchu, Taiwan) (166)

Abstract: How to Enter Modernity? This question has been the most urgent and significant issue that the Chinese nation has had to face since 1840. The term "modern" is not merely a concept of time, but refers to a certain substantive meaning. As a cultural concept, the Chinese nation's understanding of modernity initially stemmed from Western material objects, namely, the so-called "strong ships and powerful cannons." After the defeat in the First Sino-Japanese War, it was believed that modernity was not only about objects but also the systems behind them. Following the failure of the reform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issue of systems was further extended to the realms of thought and culture. After 1949, although the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were politically separated, their desire and pursuit of modernity were consistent. However, under the structure of civil war and the Cold War, both sides pursued modernity in different ways.

Keywords: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Modernization Theory, Four Modernizations, Chinese nation, modernity